

产业扶持应告别“晴天打伞、雨天收伞”

本报评论员 杜鑫



也更加惜贷，企业困难重重。业界呼吁，政府部门和银行应改变“晴天打伞、雨天收伞”做法，在行业面临困难时给予更多帮扶。

除了生猪养殖业之外，光伏、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LED等产业都曾不同程度遇到过类似情况。当产业发展前景可期时，优惠政策、银行贷款等纷纷围拢过来；当产业发展遇到瓶颈时，扶持政策、贷款纷纷抽离，不少项目烂尾甚至无人问津。

“晴天打伞、雨天收伞”的做法往往导致产业大起大落、无序发展。“晴天”时一些产业急剧扩张，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雨天”时则不少项目烂尾。前几年，各地投资集成电路的热情不断高涨，部分地方盲目上项目，一些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业”也掺和进来分一杯羹，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之后，多个百亿级大项目先后停摆，不少“明星”项目人去楼空。

与此同时，一些产业的发展容易形成依赖政策的惯性，甚至被不法分子钻空子套利。相关政策在“晴天”时跟风扶持，还容易滋生温室里“躺赚”的风气。比如，一些地方以真金白银

的补贴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一些车企却编造虚假材料、交易凭证和记录等骗取。随着补贴逐渐退坡，“裸泳者”慢慢现身。

产业扶持出现“晴天打伞、雨天收伞”状况，归根结底是相关职能部门及银行等只看眼下利益，不计长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晴天”时，扶持政策见效快，更容易出政绩。面对飞速发展的产业，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一些地方盲目跟风，甚至相互攀比，导致相关产业项目遍地开花。以光伏产业为例，高峰期时，有超过280个地级市或者工业园区提出要打造千亿元新能源或者光伏产业基地。而当大潮退去，多地扶持力度随之减小。

银行贷款看重的是利用产业资源获取更多收益。当“晴天”时，市场有需求，企业有利润，银行通过向企业放贷获利的机会多；而当“雨天”时，放贷可能会形成坏账，导致银行损失。疫情之下，个别银行对中小企业抽贷、限贷、断贷，就是“雨天收伞”的典型案例。

产业扶持要摆脱“晴天打伞”的状况，需要跳出地方化、部门化模式。当下，不少产业政策的制定、落地，往往是依行政区划，各

搞各自的，容易形成盲目跟风、攀比式竞争。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通盘考虑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包括具体某一产业的协调和规划。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发展适宜的产业，或承接产业链条中的某个环节，从而有效避免一拥而上、重复建设。同时，应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强化风险意识，对为了政绩不顾资源浪费、造成重大损失的，或盲目跟风引发重大风险的，应该坚决问责、追责。

为避免“雨天收伞”，则应提高产业扶持政策的预见性、灵活性、可持续性，形成救急机制。产业扶持不能一蹴而就，要着眼长远，既可以在顺境中锦上添花，更要在逆境中雪中送炭。尤其是对如何保障“雨天”救急措施落地、化解银行等相关方的风险等，应提前做好预案，有备无患。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产业扶持问题上，相关部门要遏制住急功近利追求速度与回报的冲动，以更长远、更宏观的视角来制定、推行产业扶持政策，让从业者能沉下心来，有信心、有定力走好产业发展、升级的每一步，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陈华

朋友圈里有一种“晒幸福”叫“晒”故乡，节假日期间尤为多见。照片中，有人“晒”和年迈的父母一起整理菜园、打扫庭院；有人“晒”带着家人一起下河捕鱼捉虾；有人“晒”乡野的采摘；还有人“晒”童年的旧居……

这年头，如果没个深山里的亲戚，似乎都不敢说自己时尚了。那曾经不愿提及的“穷亲戚”，那些略带“土味”的乡村生活，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浓郁的乡愁？

或许乡愁原本就藏在很多人心底，只是现代化的美丽乡村加速了这种情结的浮现罢了。

去很多曾被大山阻隔的村庄采访之后，我隐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路修得好的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都盖得漂亮；凡是村容村貌整洁、烟火气十足的山村，路都修得通达顺畅。

这话听起来有点互证的诡辩，却是事实。

大山里的人，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与外面世界的沟通与联系。一旦交通通畅了，大山的阻隔被打破了，幸福的大门也就打开了。

有个山村里的朋友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两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并且在城里安了家。孩子们孝顺，准备把老两口也接到城里去。老两口舍不得山里的家，一直在犹豫。这几年随着家乡的路越修越好，两个孩子发现了商机——可以通过电商把家乡的“山货”卖出去，于是干脆返回村子当起了“现代山民”。孩子们说，以前就算想在家乡盖一幢房子，也找不到能够把建材运上山的车子。现在路通了，山村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对世代扎根山村的村民来说，什么是幸福？或许就是守在“自家的草窝”里也能搭上科技发达、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的便车，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

与外部世界连接有两个基本通道，一个是线上的互联网，还有一个是线下的公路。两个都很重要，但如果说让人和物能够在山里山外自由出入，线下渠道或许更胜一筹。山区不比平原，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如果没有连通外面世界的公路，有些村民一辈子的生活半径可能都没跨过眼前的山梁。如今，一条路改变一群人生活的故事已屡见不鲜，比如，穿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里的公益“慢火车”，开行在秦巴山区的“小慢车”。

在我生活的安徽省，公路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曾经，一位省直机关的老同志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他们从合肥去安徽南部的黄山出差，坐大巴车单程就要花去大半天时间，如今，上午去黄山出差，下午便能赶回合肥——来来回回像飞一样。

经济发展讲究区位优势，可有时区位就在那里，至于是优势还是劣势，关键要看交通发展得怎么样。因为有路，“山里的土货”可以插上腾飞的翅膀，好风景可以变为“好钱景”，大山再也不是那个与外界少有联系的地方……

“要想富，先修路。”这一发展理念早已是共识。全国上下，诸多地方都因公路的开通而有了更快更好的发展，人们也因此获得了更美好、便捷、舒适的生活。然而，这一理念当初被接受和践行却历经了一番波折和考验——上世纪80年代，当安徽决定要修一条连接邻省会城市南京的高速公路时，有人质疑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修高速公路的必要性，有人怀疑高速公路修好后没有车辆行驶怎么办。如今，这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继去年实现“高速县县通”之后，安徽又提出“高速县城通”的新目标，即让全省所有县城区实现15分钟内上高速公路。可以预见，在修路致富的理念指引下，人民幸福生活的大门还将继续变宽。

“轻量化婚礼”值得更多新人“抄作业”

李秀荣

不必盛大，不必亲友到场齐聚一堂，不必麻烦朋友一起忙活……如今，草坪婚礼、露营婚礼、乡村婚礼逐渐流行，还出现了能够网上参加的直播婚礼，所有祝贺都通过屏幕、红包传达。年轻人的婚礼，从观念到形式都在发生着变化，从资金准备到具体实施，都在向轻量化方向发展。（见5月30日《中国消费者报》）

“轻量化婚礼”之所以渐渐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反复，影响了人们举办大型婚礼的意愿与安排。严防严控疫情，需要全社会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于是“两个人的婚礼”“两个人加双方父母的婚礼”“一桌酒席的婚礼”乃至“云婚礼”等，成为不少新人的选择。

另一方面，随着各地对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倡导，喜事新办、简办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不少人的婚庆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大操大办，而是追求“小而精”“新而美”，虽然婚礼规模不大，但处处体现着个性、创意和温情。

“轻量化婚礼”减轻了劳累，节省了开支，杜绝了攀比，是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正如有人所说，“婚礼花钱多代表不了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现在大办婚礼反而会引起朋友们的议论，被说虚荣、不会过日子”。

从更广的层面看，传统婚俗中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已不能适应文明意识、道德素养普遍提升的当今社会。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乐见婚俗领域出现更多类似的鲜活样本，让相关样本带动婚俗改革取得更大成效。

进而而言之，为爱减负还可以做得更彻底。比如，除了婚礼仪式，还应提倡低碳礼、零彩礼，防止彩礼成为“甜蜜的负担”，杜绝此前一些农村地区家庭因彩礼返贫的事情再发生。

将婚礼轻量化，将彩礼象征化，应成为新人及其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事实证明，积极拥抱新婚俗，婚礼同样可以拥有仪式感、幸福感。当然，移风易俗绝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需要更多家庭形成理性、科学的认知，共同将为爱减负进行到底。

婚姻更和谐，家庭更幸福，社会才会更稳定——“轻量化婚礼”值得更多新人“抄作业”。

全面控烟需要更健全的立法保障

张淳艺

从此次发布的报告看，我国的控烟工作在烟草监测、烟草危害宣传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近年来中国成人吸烟率年平均下降速度远低于全球平均下降速度，烟草产销则连续增长，可见相关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做好控烟工作，除加强对烟草危害的宣传教育，引导吸烟者主动戒烟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立法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如此不仅可以倒逼更多吸烟者戒烟，让非吸烟者免受烟草烟雾危害，而且将特定环境下的吸烟行为上升到违法层面，能够引导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远离烟草，拒吸“第一口烟”。

在这方面，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效果。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被媒体形象地解读为，凡是“带顶儿”“带盖儿”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该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民文明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成人吸烟率逐步下降。

在这些方面，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被媒体形象地解读为，凡是“带顶儿”“带盖儿”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该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民文明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成人吸烟率逐步下降。

2021年北京市第四次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成人吸烟率为19.9%，提前9年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控烟目标。同样，自2017年3月1日起《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施行后，上海成人吸烟率连续7年下降，2020年为19.4%。

法律是控烟的基本保障之一，全面无烟对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一，各地各部门在制定或完善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章时，应将全面无烟的理念和要求融入其中。上海去年修订《上海市公共交通和电车乘坐规则》时，就明确规定电子烟纳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的范畴。其二，加快制定控烟法规，全面构建无烟环境。除地方性立法外，出台国家层面的控烟法规也应提上日程。早在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就起草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关部门应尽快推动该条例正式出炉，以减少和消除烟草烟雾危害，保障公众健康。

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相关办案人员因责任心不强、制度衔接出现问题等，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泄露，那么很可能使其在日后的考试、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受到歧视和排挤，甚至可能导致其再次滑向犯罪深渊。此前，先前的教育、感化、挽救等努力或将付之东流。

针对上述实践中的问题，此番实施办法均作出了回应。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主体及程序、查询主体及申请条件等全流程的问题作出了细致规定。再如，在封存内容方面力求全面，即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应封尽封”。同时，明确了信息不当泄露的法律责任，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检察监督权等。

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切实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是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彰显了宽严相济的法治理念，也体现了司法尺度与温度之间的平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尽封，体现司法尺度与温度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治病救人的原则，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确立为一项重要制度——“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重申了相关制度。云南、浙江、内蒙古自治区等地也先后出台了地方版本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

一些人可能会担心，这种封存是否等于变相抹去犯罪记录？这种容错是否会形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纵容？有必要澄清的是，其一，犯罪记录封存并非犯罪记录消灭，而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和要求的范围内，通过技术性操作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

查阅；其二，犯罪记录封存无需未成年人申请封存，相关办案机关必须依职权主动启动相关程序；其三，封存程序也有例外，“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尽管封存制度早已存在，但现实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是因办案机关对自身权责认识不清楚，进而导致相关制度落实中不够积极主动；有的是因地方性操作规范不明确，法律适用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管理失范等；还有的是因相关救济程序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4月至2022年4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及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者，共计23万余人。应该

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相关办案人员因责任心不强、制度衔接出现问题等，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泄露，那么很可能使其在日后的考试、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受到歧视和排挤，甚至可能导致其再次滑向犯罪深渊。此前，先前的教育、感化、挽救等努力或将付之东流。

针对上述实践中的问题，此番实施办法均作出了回应。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主体及程序、查询主体及申请条件等全流程的问题作出了细致规定。再如，在封存内容方面力求全面，即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应封尽封”。同时，明确了信息不当泄露的法律责任，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检察监督权等。

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切实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是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彰显了宽严相济的法治理念，也体现了司法尺度与温度之间的平衡。

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相关办案人员因责任心不强、制度衔接出现问题等，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泄露，那么很可能使其在日后的考试、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受到歧视和排挤，甚至可能导致其再次滑向犯罪深渊。此前，先前的教育、感化、挽救等努力或将付之东流。

针对上述实践中的问题，此番实施办法均作出了回应。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主体及程序、查询主体及申请条件等全流程的问题作出了细致规定。再如，在封存内容方面力求全面，即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应封尽封”。同时，明确了信息不当泄露的法律责任，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检察监督权等。

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体系，切实帮助罪错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是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彰显了宽严相济的法治理念，也体现了司法尺度与温度之间的平衡。

打破大山的阻隔，就是打开了幸福之门